

論
新
聞
自
由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編 印

目 錄

論新聞自由和報紙的責任……………一

一 在狂達上的報紙大王

二 在新聞的藉口下有傾向的誤傳

三 國際毀謗者應有什麼罪

四 沒有無責任的自由

論新聞自由問題……………一二

論蘇聯的言論與出版自由……………一六

論新聞自由和報紙的責任

巴爾契斯基著

一 在征途上的報紙大王

當一九四四年秋美聯社正社長亨特·古柏(Kent Cooper)先生帶着表面漂亮的「國際新聞自由」的呼聲踏入競爭場的時候，這是向英美的大通訊社長和其他報紙大王發起一個總運動的信號，為他們在世界各國的機關要求門戶開放和不受管制的活動。

很容易看出來，這個運動和爭取更廣泛的公民自由的，包括新聞自由的廣大人民的民主鬥爭，毫無共同之處。美國和英國的報業負責人毫無興趣在報紙出版業中擴大人民的權利。相反地，他們老早就盡力——並不是沒有成功——把整個報業集中到他們的手裏，在大資本的手裏了。

在美國和英國，報業的集中，已經不下於工業的其他部門。由於強有力的競爭，美國報紙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它們的數目（只估算英文報紙）已經由一九二〇年的二、〇四二種減至一九四四年的一、七五四種。在今日一、一〇三座美國城市裏只出版一種報紙，而在一百五十九座大城市裏，出版一種以上的報紙，它們都操在唯一的所有者的手裏，或一個集團的所有者的手裏。所有，或幾乎所有的和有勢力的報紙都是屬於百萬富翁的。根據奧斯瓦爾特·卡列道·維勒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他本人是紐約「郵報」和「民族」從前的發行人）的話，「沒有一個人能夠夢想開辦一種首都的報紙，如果他沒有一千萬或甚至一千五百萬以上的銀行存款的話」。惡名昭彰的親法西斯的發行人赫斯特(Hearst)通常被稱為

美國的報紙大王。但他當然不是唯一的一個。只能說，他是他們當中最有勢力的。例如，美聯社的真正業主是一小羣有錢的出版家，他們不僅控制這通訊社（每年收入達一千萬元）的廣泛活動，而且同時是表面上合作而加入這通訊社的一、二四種報紙中多數的所有者。另一巨大的美國合衆通訊社，是在盧·霍華德(Roy Howard)的支配之下，他同時支配着擁有十九種報紙的斯克立維斯·霍華德(Scríppe-Howard)系統。我們在英國找到同樣的報紙資本的集中。除了「每日先鋒報」(Daily Herald)外，所有大的英國日報都屬於少數有錢的業主。路透社社亦是這樣的。

但是如所週知，工業任何部門的廣大集中不可避免會引起壟斷，並且引起迫切的擴充，即是擴大在國內和國外壟斷的管轄範圍。英國和美國的報業對於這種經濟定律似乎沒有例外。路透社已經在大不列顛及英國屬地佔有支配地位；並且，在戰前，它和法國的哈瓦斯通訊社一起組織了一個國際的卡特爾，這個卡特爾在歐洲，或在亞洲和非洲都沒有重大的競爭者。在美國，美聯社和合衆社依然是競爭者。但是它們兩者都迅速地滲入世界各地。所有上述的三個通訊社都有一個廣泛的國際的支社網，並且在世界的一切主要城市擁有成千的通訊人員，英美各大報紙的外國通訊員尚未計算在內。這些通訊社和許多國家內的報紙協會訂有交換契約。還有，美國的通訊社在其他的國家設有分社，例如在大不列顛有美聯社(the Associated Press of Great Britain)和英國合衆社(the British United Press)。又，在南美洲有美聯社(La Prensa

Associated)。美聯社租借二十八萬五千英鎊以上的電報線作它的獨佔之用。

因此，我們知道這三個通訊社代表著強有力的國際資本家（或如他們自稱的商業的）大公司。沒有可驚異的，這些大公司渴望擴充，渴望經常增大它們活動和支配的範圍。但是在領導這些大公司的商人們方面，似乎把他們的經濟擴充在爭取「新聞的國際自由」的藉口之下欺騙世界人士罷？這不是含有不正當的競爭嗎？當其他的商人在世界的競爭場上尋求擴充的時候，他們不採取人類「自由」的優勝者的姿態，但用純粹營業性質的語言談論他們的利益和收入。而當英國和美國的報紙公司盡力在收集和發佈國際消息中獲得一個支配地位的時候，它不也是因為這是對它們一個有利的商業企業嗎？那麼為什麼把事實隱藏在一個虛偽的標籤底下呢？

在我看來，特別是美聯社及其社長很詳密看為爭取報紙和新聞自由的戰士所穿的民主寬袍。美國聯邦司法部不是認為一九四二年對美聯社非法毀隨發佈新聞，使其會員競爭者不能獲取消息有提出起訴的必要嗎？而法院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以美聯社阻礙新聞自由的發佈為理由而宣佈它的毀隨行為是非法嗎？的確，聯邦最高法院不會下最後判決，但如果古柏先生知恥的話，他就不會在最高法院的審判當中挺身而出，作為在爭取國際新聞自由鬥爭中的主要英雄了。因為這樣一個角色，在我們看來，很少適合一個甚至在其本國內已在職務上犯有破壞新聞自由的法律之罪的人。

我講這些事實，當然不是因為我想毀謗美聯社，而把它和早就以一個在其勢力範圍內煽惑自由競爭的獨佔公司馳名的主要的歐洲競爭者，路透社比較。

但這不是主要的事情。通訊社，大的報紙和它們的外國通

訊員的政治性質的行為，對於我國和世界普遍的公眾才是主要的事情。

的確，上述的三個通訊社社長假裝沒有政治的傾向。他們亟望把它們的新聞供給給世界上反動的和其他的定期出版物，同時宜稱他們的通訊社純粹是不依賴黨派，政府或國家的商業的企業。而且，根據他們的通訊社所自稱的獨立性，這些商人宣稱他們的企業是客觀情報唯一的自由的來源。例如，路透社的總經理張舍洛（Chancellor）先生任「世界新聞社」（World's Press News）裏所寫的斷言。同時，他用下列的，很不客觀的字句替他的公司做廣告：

「我們路透社的主要目的是保持我們的正直，為世界的報紙作真實的，公正的國際新聞服務。我們不是英國新聞的御用商人；新聞不能是英國的或美國的——它是一個國際的商品。」

我們以後將其部分析被路透社，美聯社，合眾社以及和它們緊密地結合着的報紙所供給的這種「國際商品」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品質。但是首先，簡單地講到基本的問題——報紙和通訊社的資本家的管理對於他們的工作有好的影響呢？還是壞的呢？——必須坦白地說，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他們的工作只因他們的經營是「商業的」性質而受到影響。這方面的一切主要點，已經在我們和亨特·古柏先生的坦白談話（原文登在「戰爭與工人階級」一九四五年第一期及第二期）裏說過了。我們那時曾經指出：「在美國，公民的享受新聞自由，大都依靠他們是否擁有充足的大量資本，而結果，便構成這報紙的優勢的特徵。」關於這個說明，路透社總經理張舍洛先生一九四五年二月在捷克斯拉夫協會上的演講裏，曾對於我們的論文加以評論，說道：

「這雖然明顯重要，但它只涉及問題的一面——報紙的所有權和資金供給——這問題在當時法國和歐洲其他的國家是嚴重的。」

正如我們所看見的，張舍洛先生在這裏企圖用優美的，但太空幻的姿態，以防衛對英美報紙的商業的操縱的批評。但是批評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項目，即是資本家所有者對於他們的報紙的內容和他們的通訊社的報告所施與的致命影響，能夠這樣簡單地抹去嗎？因為我們曾指出「當巨大的美國報紙的所有者有興趣於使他們的企業中獲得最大可能數量的收入時，報紙的國家的和倫理的任務，一般說來，實際上是隸屬於這個賺錢的窄小目標的。」這當然不是一方面的爭論點，或如張舍洛先生所宣稱的，「只是問題的一面」。這是問題的重要關鍵。因為其中有若管制報紙的私有資本主義制度，或商業制度的主要惡意。

這也是報紙商業化和通訊社的政治傾向的根源。說這些企業是不依靠政治的，那是幼稚的謊話。它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絕對依賴它們的老闆的。人人都知道，一般的規律是：如果老闆是一個保守者，他的報紙的傾向也是保守的；如果他是一個反動的，他的報紙將表示反動的趨勢；如果他是一個法西斯蒂，他的報紙將必然地傾向法西斯主義。而且由於在擁有巨大的商業報紙的百萬富翁當中，只有很少數的進步份子，所以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幾乎所有美國和英國的進步報紙是比較小而且薄弱，或不屬於資本家所有，而屬於一種或別種公共組織的了。

我們已經提過的奧斯瓦德·卡里遜·維勒德，一個具有非左傾思想的人，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失蹤的日報」(The Disappearing Daily)一書裏，解釋這個事實如下：

「正因為報業已經變為一種商業，所以有各種誘惑，使業主從那些有很大經濟賭注的人的觀點上來考慮一切政治和經濟的問題，並恐慌地注意一切擬定的社會和政治改革。報紙的老闆覺得他屬於商會和商人協會……他的財產和那些強有力的商業社團並列，這些社團在每一個美國地域支配着它的經濟和財政的生活；它的官員和他們的太太們建立「社會」的風氣並且常常管制所有的社會進步。」

維勒德敘述威維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招待記者會上，曾對出席的新聞記者們宣稱，在他面前，有一些必須在他的屬下，報紙老闆的命令之下寫作，否則就會失掉他們的職業。他補充行時，這樣的新聞記者有「羣」之多。有一次，他甚至於一段德國的鐵十字車帶到記者招待會上，並請其其中一個新聞記者把這帶到記者法西斯的芝加哥「論壇報」和紐約的「每日新聞」的記者與·賴尼爾，(O'Donnell)作為他對納粹黨阿諛的有功勞的獎賞。

這個「被授勳章」的記者曾工作過而且依然工作着的芝加哥「論壇報」，特別喧嘩地要求「新聞自由」。同時，它的喧嘩的發行人，麥克科密克(McCormick)，鼓吹一個把大不列顛，法國，拉丁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結成一個美國同盟的巨大的帝國主義計劃。而在美國和英國那些為一般的「自由」，特別為新聞自由大聲疾呼的人都有着帝國主義的傾向，這決不是偶然的。

例如，在大不列顛，「十九世紀及其後」(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雜誌，帝國主義政策的最坦白的提案者，最近寫出如下的話：

「國外的自由的主要防衛，在英國已轉到少數保守者那裏。對雅爾達所締結的不幸(一)協定唯一的豫定的抗議，只有從保

守者那裏提出來」。

當然，不是所有英國的保守者都喜歡亨特。古柏先生在「國際的新開自由」的呼聲之下所主持的美國新聞自由運動的特別的政治目標。例如，「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坦白地宣佈，古柏的口號是為美國借助於資金雄厚的強有力的美國通訊社獲得世界霸權而敷設道路的。

古柏先生對道反駁，是譴責「經濟學家」想把世界的交通工具的管制保留在英國人的手裏。

誰是對的呢——「經濟學家」呢，還是古柏先生呢？我以為，兩者都對。在我們的時代裏，反動所開的「商品」已經成為資本家侵入其他國家和大陸的一個有效的工具——一個比在傳播資本主義的最初的日子裏輸入非資本主義國家裏去的威士忌酒，鴉片和鴉片，無疑地更是有效的工具。而反動報紙的外國記者的作用，比傳教師更還為重要。

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報紙，編輯和記者也有各種不同的老關。有些認識他們的責任，有些只朦朧地認識它，同時有些是絕對不負責任的。那壓讓我們更密切地考察一些較大的報紙商人的「商品」，而且感觸到它罷——當然不是全部材料，而只是有國際利益的一部。

二 在新聞的藉口下有傾向的誤傳

在和亨特·古柏先生的論戰中，我們指出了一個良好的事實，就是由於美國的參加愛好自由國家反對法西斯德國的共同鬥爭中，在處理國際事件時，美國報紙的真實和忠誠的程度已經顯為增高。在戰前替法西斯侵略者活動的許多有勢力的報紙，在一九四一年開始暴露他們了；所以從前它們毫不猶疑地

誦謗蘇聯，在其間的戰爭中，他們關於我國的真實曾給予無可比擬的更大注意了。我們也承認，美聯社在一九四一年以後所發佈的消息比報紙早幾年從這個通訊社接到的有傾向的材料，是有較高水準的客觀性的。但是當我們注意這些良好的發展時，我們甚至在戰爭依然繼續的時候曾建議必須鞏固美國報紙所獲得的這種客觀性的進步。如果只要我們能夠鞏固這種有價值的成就，那麼當戰爭結束時，這成就就不會失掉了！我們大聲呼道：「作為持久和平的保證，這是極端重要的。」

但是有權威的人們對於鞏固這種向善的轉變，顯然做得不認真。因為隨着戰爭的結束（一部分甚至在盟國勝利的前夕），一些大的美國——以及英國——報紙和通訊社對於反法西斯的國際合作如此必要的真實，開始表現有增無已的藐視。而今日，它們許多已經明顯地回復舊的惡習了。

甚至當舊金山會議（其目的是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結合為一個安全組織）期間，大部分的美國報紙盡力發表關於會議進行的純然虛假的報告以誇耀盟國。使人想起這件事的，是紐約時報的一個讀者。他在柏林會議以後寫給該報的一封信裏宣稱，如果當舊金山會議正在進行時，一個來自火星的人週巧在我們的行星上着陸，並讀到這些報紙如紐約「每日新聞」(The New York Daily News)，「紐約美國人雜誌」(New York Journal-American)，芝加哥「論壇報」和紐約「太陽報」，他就永遠不會想起這是盟國的秘密會議。他回想起「紐約時報」那時候一連串下列要旨的標題：「俄國在阿根根問題上失敗」，「蘇聯在否決權上被迫讓步」，「俄國將退出會議嗎？」於是他問這些標題是做什麼目的，是否它們給予議事經過的一個正確的描寫，抑或故意要引起盟國列強間的猜疑。而這個讀者十分正確地附加一句，他說關於報人對因海

不願負責任而致報人不准列席柏林會議的訴怨。同時對新聞自由特權的夢求，他若不見激憤的根據，因為在柏林會議所發生的是要暫時保守秘密的。

當紅軍已經到達柏林近郊的時候（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有些美國報紙登載從華盛頓寄來的報導，這是從頭到尾的一個捏造，而且它說美國的斥候已經於四月十三日到達柏林，但由於俄國人的抗議而撤退，因為俄國人宣稱根據以前的協定，俄國人應當是第一個佔領柏林的。登載這謠言的「每日鏡報」（the Daily Mirror）和其他報紙的編輯會懷疑這報導的虛偽嗎？即使一分鐘？這是很難相信的。

但一般說來，當戰爭正在進行時，有勢力的美國和英國報紙不會企圖刊載虛偽的消息派毀和誹謗紅軍。然而一九四五年九月，它們大多數開始對蘇軍佔領德國作有系統的談話運動。彷彿依照命令行事似的，駐柏林的英軍記者開始以關於紅軍人員在德國和澳地利的行為的不規的捏造供給他們的報紙。

當編製他們武斷蘇聯士兵犯了強姦，暴虐和黑市買賣的故事時，這些慎重的紳士們，為了避免有說謊之嫌，故意不講姓名，時間或地點。

「觀察家」（the Observer）和「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一類的反動報紙不是這可鄙的運動中唯一的有聲名的報紙；許多其他的報紙，包括工黨刊物都是在內。倫敦「論壇」報所刊載的一篇特別卑劣的文章，引起這個「左傾」刊物的讀者的許多抗議。例如，其中的一個讀者寫道：

「我感到驚異，一張左傾報紙竟敢這樣對紅軍的誹謗，沒有一個可證實的事實，而且一個特約通訊員沒有敢簽他或她的名字。我要求你發表他或她的名字，並說明和提出事實證明這些荒謬和敵意的報導。」

顯然，誹謗紅軍運動的目的不但是破壞大不列顛和美國對蘇聯所懷抱的普遍同情，而且也斷中傷動德國居民。這顯明是美聯社傳播卑劣的捏造（藉口和上議員布律斯特會見記者之名義）的目的，其大意思謂蘇聯當局正在「肅清」柏林和德國其他部分的德國專家。這個美國通訊社的名譽顯然引起倫敦「泰晤士報」駐柏林記者的嫉忌，我們從九月二十一日倫敦發來的電訊知道，它決定呈給它的主人以下列高貴的謊言花球：

「俄國人正在誘拐英國佔領區內的德國人，誘拐案每日發生一起。受難者是科學家，技術人員或警察。」

這個英國記者的非常熟練表現在這事實裏，就是他局限於簡單的誹謗，而是供給他的誹謗以下列的甜言蜜語的教訓：「願望這種黑白將使局勢有迅速的改變，否則，它會引致盟國間的緊張關係。」

在這種「坦白」的表現裏，英國記者遠勝於美國的競爭者了。

跟着（十月十六日），德境的英國軍事當局的通訊社「盟國新聞」（Allied Press），發出一個謊言，其大意謂集體的農場已在德國的蘇聯佔領區成立；反說，這樣的集體農場證實了伯蘭登堡省裏成立，在那裏，為了這個目的，甚至已設立一特別部門。伯蘭登堡當局宣佈這個報告完全沒有根據。但是倫敦電台，用德語廣播，繼續用這種虛偽的詞匯——用不嚴的描寫「德國人的可怕的窮死」，以及用關於蘇聯政府和新的民主政府在中歐和東歐的政策荒謬的曲解的報導——供給德國居民。這些謊言逐日用優秀的德語由倫敦廣播，現在已有幾個月，帶着顯然的鼓動特徵，一半鼓動德國的法西斯情緒。

但是由於倫敦廣播和許多英國報紙的一切努力，有一個長時期他們的反民主宣傳是有點貧血的——直至路透社出來並把

它達到極點為止。十一月四日它傳播一個極情的故事，根據到邊倫敦的報告，約有一百萬德國人忽然從德國的蘇聯佔領區流入西方盟國的佔領區裏去。「這種大規模的運動將於明天（即是十一月五日）開始」，它宣稱，並且補稱這並不包括從波蘭，捷克斯拉夫和奧地利所引渡的德國人。

同日，一切大的英國報紙拚命地呼喊著謂次日將有「約一百萬德國人被俄國人強迫驅逐出境」。《觀察家》警告稱「大量德國人將於明年冬季死於路邊」。《晨星報》社稱，外相貝文已經要求關於提出的一百萬德國人被逐出德國蘇聯佔領區的迅速的報告。還有，同日這問題在下院提出來；由於外交次官麥克尼（Fector McNeil）不能夠供給下院關於這問題的任何情報，工黨議員斯托斯（Richard Stokes）急忙要求「鑒於俄國人的行為」應向蘇聯政府作「最強硬的抗議」。

但當十一月五日的悲慘日子過去了而沒有像英國報紙所宣佈的。從蘇聯佔領區「湧入百萬的德國人」的任何徵候的時候，必須把這種奇怪的事實的一些解釋提供給英國公眾。所以路透社，正如它的總經理張金洛先生向我們保證，總是把真實和公平的情報置在一切其他美德之上，迅速找出路；它把它的駐德英國司令部的記者的一篇報告供給報紙，其大意是：

「俄人顯然已撤消他們的命令」。

這是第一號的解釋。而英國的報紙在適當的標題之下刊載了——即是：「蘇聯為難民緩和。俄國命令的神祕」（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蘇聯的命令緩和」（晚報）（Evening News）、「蘇聯取消對德國難民的命令」（新聞紀事報）（News Chronicle）。

然而，不久就發覺不會有過期逐德國人的任何的蘇聯命令，所以它不會有什麼取消。路透社駐柏林記者開始含糊說出這

是一個「誤會」；蘇聯的命令，他解釋說，只適用於「幾百個非德國人，而且在任何場合，」不是命令他們立刻回到德國西部去」。事情已經有這樣的改變，「不是命令他們立刻回到德國西部去」。經過它的評論員洛依（Robert Lloyd）的請，路透社承認這已經引起下院提出質問和使外交部作成迅速的結論的虛偽報告：「一部分由於一個地方官的無根據的倡導，一部分由於一個報紙根據柏林廣播的一個不正確的翻譯而發現。」

這個忽然從這解釋的濃霧中隱現出來的驚怖的報紙是什麼呢？回答可以從下列洛依的故事裏的一句話中取：

「驚怖的發生，是出於在柏林出版的英國軍政府的報紙「柏林人」裏面這一個不正確的報導的原故。」

這就是「神祕命令」的起源！換句話說，再造出一個煽動的謊話，加上「恐慌」，經過「獨立的」路透社通訊社傳播了。

但是如果任何人以爲，這個報紙的謊話教訓了英國的定期刊物以緩和它們關於德國和歐洲事件的反動宣傳的謬誤，他是錯誤的。例如，「每日郵報」曾用下列的調子叫：

「今日在亂，喧嘩，分裂的歐洲正在尋找領導者，而她似乎不是向美國或俄國，而是向英國。決定這一代的命運的問題，就是歐洲的這頓命望是否能得實現。」

每個人知道這類事會引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已經提出反動的「新聞御用商人」怎樣勇敢地處理一些真實的例證。而這一串的例證也並非全部。而這些例證是回答讀者的正當的疑問的一種主要的補充，這些疑問是：他們爲什麼撤謊？他們的政治目的是什麼？可是民主的新聞自由是必需包含政治誹謗的自由，或不負責任的自由誹謗嗎？而這種誹謗對於民族和國家的和平共處是很危險與有害的。

三、國際毀謗者應有什麼罪

大不列顛和美國的某些非常著名的社會人士，最近曾強調增進國際合作的新聞自由的重要。的確，如果新聞是真實的而且擺脫主筆的傾向性，它無疑地會增進國家間的友誼關係。但是如果新聞是不忠實的和有傾向的並且它爲了分裂國際合作而故意傳播時，該怎麼辦呢？

一個人怎能夠嚴肅地講到新聞自由而不講到任何關於保證不從事偽造國際新聞的非常有害的實際行爲呢？可是依然有些佔着重要位置的人不能不感到，某些報紙代表和新聞通訊社依賴這種有害的實驗，但是却在他們公開的言論裏，假裝宣稱所有這些「報告消息者」只從事於探求純正的和不虛構的真實。例如，他們說所有國家的普通人民需要報人的獨立的新聞，這報人要具有對這工作的「必要的訓練」。當然，訓練是每一種職業所必要的；一個職業的有訓練的記者，知道他的雇主希望從他那裏發出有傾向的消息，而真確的事實却證實不了這種消息，但怎麼能保證他不製造所需要的消息呢？經驗不是指出許多報紙和新聞通訊社準備傳播這種故意虛構的消息而不用勞神去證實事實嗎？

爲什麼今日英國和美國的「國際新聞自由」的鼓吹者頑強地避免討論問題的這方面呢？他們能夠依賴錯誤和純粹虛構的消息的光輝的實例而避開公共的注意嗎？許多這樣的事情已經在最近發生了。我們已經引用在外國報紙上所發表的虛構的具體實例，這一切性質可以解釋爲不外分裂聯合國間和平的必要的合作。鑒於這問題的特別重要，我們認爲有引用「一些」其他實例的必要。

首先：紐約「每日時報」發表了虛偽的謠言，宣稱蘇聯軍

助公約含有一個「秘密條件」，允許法國在西方的自由行動和蘇聯在東方的自由行動。不難明白，這種虛偽的謠言只能有一個目的：引起美國和大不列顛對蘇聯和法國的懷疑。

有人會告訴我們說，要從一種赫斯特報系的報紙中，如「每日鏡報」希望真實的事實報告，是沒有用的，因爲它不是一個嚴肅的政治機關報。好罷，那麼我們拿第二個例子——一個重要的機關報，如「紐約先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來說罷。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一期上，這報紙發表了一篇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倫敦通訊員米羅(Marrow)寄來的報告，其大意謂蘇聯官方相信紅軍代表應爲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並請蘇聯政府已向美國政府提出這項要求。這是一個完全的捏造。那個通訊員難道不懂得他的捏造對於美國和蘇聯人民間的友誼關係是有害的嗎？當然他懂得的。他非常懂得的。他難道不是具有「必要的訓練」嗎？但是對於一個重要的報紙不懂得它，或者如果懂得它，就認爲它必須把這投毒箭射出去這一事實怎樣解釋呢？

與另一個例子罷。最近，某些特別敏感的騙子在一個法國通訊社「編輯通訊社」(Agence d'Édition et de Presse)，捏造一個關於正在參加倫敦的聯合國組織籌備會的蘇聯大使葛羅米柯所接到的訓令的煽情新聞。據說這些「訓令」是要求下列各項：反對三輪會議的提議；建議佔領德國期限達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前；堅持建立一個類似在德國所實行的管制委員會的遠東管制委員會，總共有八點，都是完全捏造的。人們一定明白，該製造和散播這種虛偽消息的通訊社的目的，是毒害國際空氣的，尤其是引起三大強國間的分裂的。但是有些法國報紙(「巴黎晨報」(Paris Matin)和其他)是這樣熱中於這種卑劣的傾向，所以它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發表了顯然毀

謗的言論，沒有絲毫良心的不安。

關於波蘭問題，反動報紙在戰爭當中已經傳播各種各樣的拍造，所以它們現在很難想出新的來了。但是對於毀謗者，需要具發明之母。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美聯社駐華沙記者勒里·阿連(Larry Allen)報告「紅軍第二次佔領波蘭」。古柏先生的通訊社把這惡意的謠言傳播全世界。它被某些巴黎報紙特別熱情地採用而且自鳴得意。在十月十八日的法國「晚報」(L'Aurore)裏，杜米尼格·柏勒杜(Dominique Prado)寫道：

「波蘭曾經是一個偽造的國家，昨天才真正成爲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了。昨天，紅旗飄揚在華沙，克拉科和十五個其他城市之上……」

他搜查理士·仲馬(Charles Dumax)在法國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裏用如下的說明所支持了！「這是紅軍佔領波蘭一切主要城市的事情……」

幾天以後，毀謗者默默地把這個關於「第二次佔領波蘭」的大謊實略去了，而恢復他們的日常的細微的捏造，例如說蘇聯正在沒收戰後救濟總署在波蘭的物品，掠奪她的農夫，擄走她的家畜，等等。「芝加哥太陽報」駐波蘭的通訊員伯特(Brecht)，裝滿了這些不暇的虛構謊言，所以在十一月十七日他公開自供道：

「這些謊告只是從波蘭境外聽來的。甚至蘇聯在波蘭最激烈的批評家都不縱容這種謊告。這種虛造是特別殘酷和危險的，因爲如果戰後救濟總署的供應品在波蘭停止，或被減少，波蘭人會餓死的。」

伯蘭特在這裏所表現的理解是十分正當的，特別是在美國參議院有名的決議的見地上，這決議禁止在美國報紙代表享受

不到行動的無限自由的國家內利用戰後救濟總署的資金。

讀者諸君或許記得，美聯社正社長古柏先生喜愛談論和蘇聯的觀念不同的特別美國的觀念的新聞自由。然而很難相信美國觀念允許毀謗的自由；而我們絕對不相信，美國人真的鼓吹濫用這種新聞自由。或許只有古柏先生和那些想跟他一樣的那些人採取這樣的一種態度。這是他們要求在波蘭的行動無限制的自由；而當他們的代表訪問那個國家的時候，全世界的美聯社的顧客開始接到從華沙來的純粹捏造形式的「新聞」，如「紅軍第二次佔領波蘭」的空想故事，和諸如此類。他們也要求在巴爾幹行動的無拘束的自由，而當他們的代表到達那裏的時候，我們得到下列的新聞標本：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美聯社發佈它駐索非亞記者寄來的關於強大蘇軍在保加利亞，土耳其邊境舉行演習的一個不忠實的報告。當然沒有演習；但是美聯社的完全奸詐的新聞在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百萬報紙讀者當中被作爲「可靠的消息」傳播了，並且給予許多報紙以藉口，對於「蘇聯侵略」土耳其的斷定的危險表示驚異。

這類謊言和毀謗是毒害國際空氣比公開號召一個「新戰爭」更爲有效力和危險的手段，不是很明顯嗎？今天，比以前更反對戰爭的人民，很尖銳地反抗這種犯罪的號召，當這些號召出現在美國的親法西斯報紙和意大利的某些天主教的報紙上的時候。而當一個人如雅爾德(Yard)在土耳其號召魯格薩克遜人民把原子彈拋在巴爾幹人民的頭上的時候，或當英國法西斯將軍福勒(Fuller)寫稱「戰爭對於文明的健康是必要的」，所以「如果沒有一個敵人，他就要創造敵人出來」的時候，廣大大眾無疑地避開他們，如同避開那些被惡魔迷着的人們一樣。所以，那些追求帝國主義政策的較機敏的人們，現在禁止那樣

公開地講了；他們盡力破壞在戰爭中廣泛地建立的愛好和平國家的團結，並逐步為製造國際衝突準備動機。

如果我們要了解這些狡猾地捏造的「消息」所隱藏着的政治意義，必須了解這些「消息」是今日持久和平的怠工者所運用的，他們不是攻擊和平的觀念。不，他們一點也不！他們是「公平的觀察家」。他們不煽動誰反對誰。他們只是供給社會以「新聞」。但是他們分佈的一部分的「新聞」是不忠實的；不是愚笨的不忠實，而是充滿政治的誹謗，這種誹謗對於輕信的公衆比任何公開的煽動具有更有勢力的影響。

虛偽消息的沿街叫賣者的更多的機敏，常常盡力把他們的誹謗和公衆所發生很大興趣的當日題材連繫起來。這方面的特徵是最近出現一種可以稱為原子誹謗的政治誹謗。例如，九月初「華盛頓郵報」發表一個虛構的報告，其大意謂三年前，由於蘇聯政府的命令，購得了加拿大的鈾鎊的股份，其結果就是加拿大政府把這些鈾山收歸國有。十一月十六日，法國「時代報」(Epoque)「登載一篇報告，其大意謂正在研究核能力的著名法國科學家朱里奧·居里(Joliot-Curie)，「應俄國政府之邀請，乘一俄國飛機前往莫斯科」。『這一旅行』，報紙繼續暗示地說，『在倫敦和華盛頓正在密切注意中……』法國教育部不得不發表一公開聲明稱，雖然「時代報」刊載的報告堅謂「從一絕對可靠方面」獲悉，但是朱里奧·居里不會到任何地方去。

根據上面列舉的事實，可以證明一些報人和供給國際新聞的大通訊社的代表從事於傳播犯罪的毀謗，一方面反對各國和民族的安全，另一方面反對世界和平。這的確是控訴國際的政治誹謗者的要點。

如果我們注意那些常常在國際誹謗者火線下的國家，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重要約符合：它們是在「國際新聞自由」的鼓吹的

假裝下進行報紙運動的同樣的國家。它們不是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有反動的或法西斯政體的國家，而在那些國家裏外國記者的活動是受到當局的嚴格管制的。為了一些理由，大不列顛和美國的反動報紙在這些國家裏不要求官方的干涉，其目的在為英美報紙的記者保持特權。英美資本家的報紙大王的聲望運動集中於蘇聯和那些由蘇聯軍隊從希特勒的羈絆中解放出來的民主國家。他們猛擲政治誹謗的炸彈以反對這些國家，這種炸彈在分散保證持久和平與國際安全的人民的聯合力量。

這種「行動自由」對於不願與國家命運的報紙組織者，是民主的公衆人士所能容忍的嗎？必須抑制正在利用有毒的政治誹謗的利器以反對別國，和反對愛好和平國家間的國際合作是墮落的報人的合法保證的時候，不是到了嗎？

此外，在這方面，我們也必須研究最近的事實，特別是當法西斯侵略者強烈地從事準備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期中殘酷的鼓譟。在他們反對集體安全的聯合戰線的組織的鬥爭中，他們不是經常地獲得大不列顛、法國、美國和一些其他國家的反動報式的幫助嗎？這還不夠使我們想起張伯倫和達拉第政府的責任，這些政府默許法西斯侵略者的計劃和鼓勵其成功？因為無可否認在大不列顛、法國和美國用慕尼黑陰謀的精神造成輿論，主要的角色是由報紙和大通訊社的反動代表所扮演的。他們用一再保證的報告來欺騙公衆，例如：「希特勒說他贊成和平」。這就是他們傳播無窮盡的關於「俄國的侵略計劃」的誹謗的敘述。而這些毀謗者攻擊抵抗希特勒德國的藉口的一切努力——例如，法國的人民陣線的努力——為「挑撥戰爭」。到了相當的程度，由不忠實消息的職業御用商人所形成的有傾向的輿論，麻醉了西歐民主力量維持和平的努力。歐洲人民已經付出太高的代價以制止這種卑劣職業的重新出現。

邪惡，是不能忍受的，必須尋找有效的方法來治療它。

四 沒有無責任的自由

什麼方法能夠抑壓某些國家的報紙和通訊社的某些機關報的犯罪的言辭呢？

西席爾(Cecil)爵士有一次在國聯的會議上宣稱，報紙的合作「積極上支持和平方策和消極上抑制不忠實的和惡毒的新聞」都是必要的；但他不曾講到怎樣獲得那些報紙的合作，它們在任何時期都不願意為這目的而合作的。這毫不驚異。它不可能獲得這種合作，如同不可能把兩個禿頭的人用頭髮綁在一起一樣。顯然，這是為什麼沒有人嚴肅地接受西席爾爵士的坦直的建議。溺於自騙有什麼用呢？

現在正在美國做廣告的另一種治療法，就是編著「新聞倫理學法典」。例如，在美國的法國新聞處處長華勒(R. Valentin)，曾建議在戰爭當中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應該編著這樣的一種法典。但是他難道不知道美國的空閑的紳士們早已編著一種以上的這類的法典，並且都被微笑地接受了嗎？恐怕甚至赫斯特或瑞克科密克未必拒絕對於任何的「倫理法典」宣誓忠誠罷。而正是這種情況，證明了榮譽的法典實際上不久由一種自欺的方法，變為欺騙別人的方法罷了。

第三種可能的治療法是檢查制度。這種可以被認為和國際誤傳消息者的犯罪攻擊鬥爭的一種適當方法嗎？不。為什麼？因為它不可能在各種不同的國家中間建立同一樣的檢查制度。檢查制度甚至在一個國家境內是一種邪惡，當那國家是在反動的或保守的政權底下的時候。

然而，從真正民主政體的觀點上看來，譴責一切檢查制度乃是錯誤的。只有那些偽民主份子才這樣做的，他們想隱蔽兩

種主要形式的檢查制度中的基本的政治的異點。在一個反動政體上的檢查制度是一種事：它是用來反對人民的民主熱望的，所以它應該受到非難。在一個進步的，民主的政體之下的檢查制度是另外一種事：它是用來反對人民的敵人的法西斯的虛偽宣傳的。在某種情況之下，它是保護民主的一個主要的和有用的武器。在非難「一切」政府的統制報紙時，新聞御用商人盡力隱瞞這種事實，就是他們本身——報紙發行人和他們編輯部的代表——想出對他們的出版物的萬能的私人的統制，這種統制一般地並不比反動政府的管制要好些。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統制報紙的最可能的方式，無疑地是民主的公共組織所執行的很好組織的統制。但是自從在世界較大部分的進步的，民主的組織對於報紙的影響依然很少，而且有權威的私人所有的報紙依然隨意散播對於國家間的和平與合作事業有損害的有毒的毀謗後，所有進步和民主的國家，特別我們的蘇聯國家，都有權利和理由設立檢查濾清器，來保護他們的飲水貯水池，以免被這種污穢物玷污。

一個民主的國際檢查制度既不能建立，那麼難道沒有其他方法壓制國際誤傳消息者對世界和平的利益和愛好和平國家的安全的最大的違犯嗎？在我看來，他這種違犯者應負刑事責任是有效的方法。為了制止不必要的混亂，我以為最好檢舉少數的報紙罪犯，它們在國際上是危險的——就只說下列兩種罷：

(甲)有系統地挑撥戰爭的；

(乙)對任何愛好和平的國家從事政治的毀謗，即是，故意地散播關於這一國家的行動的虛偽情報的。

由於強國間的協定，已經開始檢束戰爭的煽動者。這引起一些希望，就是可能對假法西斯報紙有系統地煽動戰爭的放肆的機關提出法律的起訴。這種煽動，由於報紙的幫助，常常是

戰爭的煽動者，為準備侵略動機而採取的主要方法之一。

我們曉得，在大多數國家裏，毀謗任何一個人的人格是法律可以懲罰的罪惡。抑開誹謗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或國家，不是更重要一千倍嗎？這種抑罰是被整個國家的榮譽和安全所指引的，同時是被一切民族的共同利益，被招致和鞏固國際和平的願望所指引的。

不用說，現在我們只在原則上討論這個，先不必分析這個國際法和裁判權的進步發展所引起的法律問題。無論如何，這暗示着這些事件會在根據特別的國際協約執行的一個國際法庭的裁判之下產生。我們必須記者，許多事件不易適合於由國際法庭強迫的審理，由於預料有勢力的報紙會作強有力的反對，因此需要，首先，限制國際法庭對那些要求在別的不受管轄的國家裏活動權利的報人起訴的裁判權。

什麼能夠原則地使任何一個有濫用國際新聞自由之罪的人反對有關的犯罪責任呢？這裏沒有暗示着要限制政治批評的自由。曾在倫敦的「新聞紀事報」熱烈主張「在報紙和誇耀有批評任何政府之權」的康明（Cummins）先生，可以安心了。先生們，請利用任何方法來批評，但必須是提防有惡意的誹謗，即是故意地傳播關於其他國家和政府的不良消息的。只有這種誹謗——不是批評——我們想提供給法律審判。至於康明先生的驕傲的聲明「在西方的民主政體裏，我們不允許政府決定什麼是毒的和什麼是沒有毒的」一樣，我們東方的民主政體能夠帶着我們慣有的溫柔回答：「很好，先生們，讓一個最公平的國際法庭決定你的行動是否有惡意的或善意的罷。」

美聯社的古柏先生要求國際協定的締結給與外國記者以外交特權和完全的行動自由，到處低價利用交通的一切工具，等等。然而合衆社社長白里（Paley）先生反對這種範圍廣大的

要求，並且相信古柏先生已失掉了他的現實意識。當我們不想干涉這種美國的論戰的時候，我們却願意詢問古柏先生是否準備代替了保證在歐洲國家的新聞自由，來甘受一個國際法庭的裁判，如果有一種惡意誹謗任何愛好和平的國家的證據控告他的通訊社的話。準備呢？還是呢？如果他準備，那麼我們希望法庭將是公平的和十分嚴格的。

然而，我很害怕，古柏先生曾不自願地承認有使政治的毀謗者在一個法律的國際法庭面前受害的必要，並且他會把這種提議描寫為一種「對新聞自由的威脅」。剛剛最近他就斷言，對從事非法破壞新聞分佈的美聯社提出起訴的合衆國政府，是「威脅着新聞自由」。顯然古柏先生屬於商人的一類，這種商人想把高業的一切利益置人毀壞，但拒絕負任何責任。

這是一個錯誤態度。在報紙和新聞傳播專業裏，它特別應該堅持沒有責任就沒有特種的深奧的公平原則。如果你想要自由，那麼你就必須負責任。而且，當然不僅要記者負責；報紙和通訊社的主人和社長必須首先來負責。讓他們有貶低的價格罷，如果他們願意為政治的毀謗和有系統的挑撥戰爭而負高度的責任的話。

至於張舍洛先生說，路透社（他是總經理）「不是英國新聞的御用商人」而是一種「國際的商品」，我們將冒昧說，在我們看來，他沒有必要這樣隨便的棄絕他的國家。如果張舍洛先生公開地作為著名的一個英國商品的御用商人走出來，只要這種商品不是關於「百萬德人被逐出蘇聯佔領區」的煽動的性質，這就會好得多了。最後，一個人可以成爲一個良好的英國人，和同時尊重別國人民為克里米亞會議宜言所正確描寫的「人類最高的熱望」，即是為持久和堅固的和平而作的高尚努力。（譯自「新時代」第十三、十四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論新聞自由問題

N·謝爾蓋也娃著

我們看到了澳洲政論家，幾種社會政治書籍和小冊子的作者A·曼德爾的一部新書，叫做『報紙為社會之敵』（A. E. Mander, Public Enemy of the Press, Sydney, November, 1944），該書是一半年以前，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出版的。

這部不大的書在澳洲掀起了許多騷動。它引起了報界激憤的反響並在出售一小時後即由書店中消失。後來才曉得，全部印出來的書依照經紀人的命令都被購買和沒收一空，他們不願意曼德爾的暴露深入於廣大的讀者層裏去。該書出了第二版，爲了使它能普遍銷售起見，出版商利用與報紙新進加無關的書店去傳賣。

曼德爾的著作指明了那種真理，即所謂無法掩飾的真理。它論到最爲切要的問題——新聞自由，這是今天許多人，特別是所謂西方民主的擁護者們在談論的題目。他們認爲新聞自由是這個民主的最重要的特徵，稱讚它爲最高的成就，說它是全世界理想的模範……曼德爾的書對我們特別感覺興趣的是因爲它用許多事實豐富地描繪出了一些『新時代』上已經發表過的一般的原則主旨，由此可以看出昂格羅維克羅各國的惡名遠播的新聞自由的實質是什麼了。

曼德爾的書中談的不但是關於澳洲的報紙，也有關於英美的，因爲澳洲的新聞自由向美國和英國的是一樣。但他的觀察並未包括建立在另一種基礎上的工人的報紙，工人報紙在那環境中所享受的新聞自由是極端受限制的。他寫到澳洲、英國、美國組成大企業家的私有財產的報紙雜誌出版的主要集團，他們保有印刷所、編輯部、出版部，就像他們保有礦山、工廠

和銀行一般。他們保持報紙的私有權也正像在任何工業或商業企業中保持其私有權一樣。但是爲了維護它需要一種附加的武器，即所謂新聞自由。

作者深悉報界的情形，它的性質，狀態以及經過報紙的與論修正的一切複雜的體系。在幾十年來他自己就是親身經歷的。他對於報紙的作用和活動的描寫是很驚人的。

他寫道：『採用新聞自由廣泛地認爲是民主的本質的特徵。報紙自由的社會意義像是接受公理一樣。它是『我們』所享受的最寶貴和神聖的權利之一。』

『可惜，這只是一句空話。實際上並沒有任何損壞之點。』（原書第五頁）

作者把『我們』二字加以引號是因為新聞自由實際上只有某些人在享受着。這自然不是印刷所的工人，人家給他們什麼他們即印什麼。這也不是編輯、通訊員、訪員、一般所謂新聞記者——他們只能寫一些於僱用他們的出版家有利的文章。享受新聞自由的只是少數的一羣人，他們保有報紙並且在監督着它。曼德爾說，應當放棄『新聞自由』這個術語而代以另外的一個術語：『報紙老闆的自由』。

他寫道：『如果能廣泛地採用這一術語，則我們即可避免許多的曖昧不明了。這可使我們區別每天在報紙上所見到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文句。無疑地，這可能消滅那種不斷強調的言論，即不可侵犯地在與那些人的關係之下保持『自由』這個字的神聖的原則，對於民主文明是異常重要和完全必需的，這種人不管他是繼承或獲得報業的股份，也不管他是聰明還是愚蠢，是

個真誠的愛國者還是沒良心的騙子，或者他唯一的目的是在保護他的私有的物質利益。」（原書第六頁）

沒有巨額的資本，根本不能夠出版報紙。這就是說，只有有錢人才能做這種類似的嘗試。在澳洲有六個經紀人，六個大企業家監督着每週發行一千一百萬份的報紙。

在分析澳洲報紙的金融監督的一章裏作者列出了報紙老闆的名單，經過他們報紙與工業和金融界緊密地連在一起。最大報紙（「太陽報」Sun），「星期太陽報」(Sunday Sun)，「導報」(Herald)，「太陽畫報」(Sun Pictorial)，「雪梨晨道報」(Sydney Morning Herald)，「阿地拉斯新聞」(Achtand News) 等)的所有者即是許多工業公司、銀行、特維斯等的經理和股東。

曼德爾寫道：「如果認為本章內所講的那些金融和工業集團在對報紙指示着自己的政策，這種想法就錯了。是的，在報業的經理上他們有着自己的直接和間接的代理人。但對他們很少施以任何的壓力。報紙老闆「自然地」了解他們的觀點並且「自然地」支持他們的利益。在報紙老闆們和大資本之間不僅結有經濟的，而且也有社會的關係。由於這些經濟的和人事的關係，報紙的老闆出版家就負有代表那些監督工業的各大部門，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集團的利益的義務了。」（原書第七十八—七十九頁）

報紙老闆有自己私有的而且很嚴格的檢查制度。事實上報上所載的一切都要服從於它的，由論文至微末的記事，以至廣告等。無論是最微小的問題，還是頭等國家意義的大事件，都要歸它所管。

「通常出版家的檢查不涉及那些使在他的報上登載廣告的廣大的顧客們失掉信仰的事物……

「對於記載業務公司的不友好的消息却不能被允許登載，因為報紙老闆，他的親戚或朋友都是這個公司的股東。

「報紙老闆的檢查也涉及到政治方面。政治家演說詞中最重要的部份不得刊載，如果他們的政策是違反報紙老闆的利益的話……

「：報紙老闆（發行監督者）制定了報紙「政策」的總的路線，這個路線是支持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吹捧一個政治家而對另一個加以冷淡或打擊；廣泛地宣傳某一運動而完全隱沒（或刊在最後一頁的底腳）能引起反應的事物。」（原書第三十六頁）

這樣，新聞自由的神聖性，像曼德爾所說的，就完全包括在十家報紙顯貴們的手裏，依照自己的裁奪利用新聞以適應自己私人的利益與企圖。

製造輿論的辦法是很狡猾的。報紙老闆不僅在社論和其他的文章裏宣傳自己的思想，而且還採用目前事件的適相啓發的方法。

曼德爾寫道：「報紙偽善地肯定說發表意見和新聞報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情。事實上澳洲所有的主要報紙現在都在精密挑選消息，使它遭受檢查，修改並且常常加以歪曲以影響他們讀者的意見。」（原書第十二頁）

作者舉出了許多例子以證明藉助於最平常的情報之適當的「供應」以製造輿論。方法是有各種各樣的——從登載附以庸俗的，危言聳聽的，歪曲其意並使讀者失望的標題的正確消息，直到對事實的沉默和直接對它的歪曲，以及明知其為虛偽情報的登載，不負責任的傳播，製造白晝鬼見鬼的消息。

報紙老闆最為理解讀者大眾所要聽得的是真理，不喜歡可恥的把戲。因此，愈是虛偽和不公正的報紙就愈要表現其為誠實和正直的。最反動的報紙賭咒說自己是忠實於高尚的社會理

想，忠實於民主的原則，嚴重地保證自己是公正無私和立均客觀的，使說是尊重政黨的意見。曼德爾在其著作的題名為「正義的要求」一章裏用下面方法說明報紙老關怎樣在真正地理解「公正的遊戲」。

「顯而易見，他們認為公正遊戲的理解就是使用檢查並對一些消息保持沉默，因為它們可能給讀者以違反報紙老關的見解和利益的影響。他們的理解公正的遊戲就是利用引證者於誤解的標題，粉飾消息，斷章取義，歪曲演說者語義和甚至添造一些人來從來沒有說過的东西。這種理解也就是在顯著的地位登載絕對低造的消息，附以惹人注目的標題；以及第二天對它的更正，——但已經用的是很小的字體而且是在報紙的最後一頁不顯著的地位。」（原書第四十七頁）

試舉「舊俄」子來看。在字報的「每日電訊報」上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登載了下面的一條消息：

「德蘇聯軍與梵蒂岡之間在進行談判。」

「德蘇聯軍與梵蒂岡之間在進行談判。」據「克里姆林宮消息」已致教皇一備忘錄……一般報章備忘錄中提到交換意見了。」

三天之後該報又登載一段聲明，其中十分之九是重複上面所說的，而其餘幾行則作為補充說此項消息已經官方否認。

曼德爾寫道：「然而竟把隨便得來的消息作為真實的情報加以登載。它似乎是得之於倫敦的其不知名的人士。這位匿名者到底要強調些什麼呢？「感德」些什麼？是誰在傳說？牛奶販還基理髮匠？甚至還：「據稱」克里姆林政府還採取了某些步驟。是誰講過這種話呢？女會計員嗎？而最後又是「一般推察」備忘錄中提的這樣那樣的。」「一般推察」，「據稱」——這一切似乎是依據於由倫敦拍發電報的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的話

（原書第四十三頁）

曼德爾認為澳洲報紙上關於蘇聯的情報是新聞自由所給予報紙老關的權力濫用之最顯明的例子。他費了整整的一小章來談論這個問題，此章值得我們全部引在下面：

「大概，在新聞業的全部歷史中，二十年來對於有關俄國一切正確消息的永遠的沉默正是這種檢查的最明顯的例子。二十多年來，從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直至一九四一年俄國成了我們的盟邦和在戰爭中我們得救的希望為止……澳洲的報紙關於蘇俄的情報宣傳只是登載一些那樣的消息，其中講的是關於不斷的失敗和貧困，關於建設工業的無結果的試驗，以及關於類乎瘋人院政策的國內政策。」

「因此，當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絕大多數的澳洲人知道了俄國真實的時候，他們就受到了打擊。報紙出版業的檢查被拋棄於一旁。甚至出版家自己也不再能夠制止關於戰時俄國的真實消息之強有力的急流了。這表明了，不管怎樣糾纏起來覆去的說組織工業試驗的可憐的失敗，但在俄國還有那樣強大的工業發展，這種發展幾乎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沒有的。代替被壓迫的人民，無知的奴隸在我們面前出現了熱誠，傲慢和自信的人民，他們注視着光明的未來，準備為了他們祖國的福利，他們的事業，以及他們自己所建設的新社會秩序而犧牲自己。」

「但是到底為什麼報紙老關在二十四年之間執拗地不登載關於俄國的任何真實的情報而刊載的只是一些不管怎樣不合理的消息，說新俄國在工業、社會與道德關係上的全般失敗？為什麼呢？他們害怕澳洲人會得知，沒有報紙的私人老關，沒有商業廣告，沒有小販子的文明，國家也會繁榮，發展和達到輝煌的成就。」（原書第十八—十九頁）

報紙依賴於貪慾、自私、業務的利益反映在對於事件的新聞報導和表明態度上面。報紙在自己的篇幅上充滿了一些廉價的煽動，鼓吹微小的事件，努力把讀者的注意和思想從總有興趣並使他興奮的問題移轉到無聊的事情上去。這一切不僅在澳洲是如此的。

曼德爾引證了英國名記者漢密爾頓·費甫(Hamilton Fyfe)的聲明，費甫的結論同他的本意並不一致。

費甫寫道：「我們如果想由嚴重的問題把話題引開，我們就得談些無聊的小事。報紙想要引讀者的不注意社會的變革，就得懂得它們只有用別的問題來佔據他們的頭腦以達到此一目的：『沒有什麼可以喚起思想的活動——他繼續寫道——』，也不應當向讀者提議什麼。新聞應當注意生活的表面，鼓舞表面的興趣，刺激空虛的情緒。在描寫事件的時候，比起事件本身來應當更加注意其中的人物，如果他們不帶有煽動性質的話。譬如表現英國財政大臣向下院作關於預算報告的照片（特別是與其夫人在一起的），要比他報告中所引用的數字的分析更引人注意。關於政治人物的流言，他們的習慣和瑣事都要比他們主張的政策或發表的言論在報紙上佔的地位多，甚至這些政策和言論接觸到整個社會的緊要利益。」（原書第五十六—五十七頁）

曼德爾的總的結論是很尖刻的：他宣稱報紙是社會的敵人和民主的敵人。當然，也有例外的——工人報紙和民主人士的某些機關報，但這種例外並不多。發行幾百萬份的報紙出版的基本要素是少數大經紀人羣的私有財產。在這個陣營裏，當然也有各種的傾向，各種見解和意見的暗影，對個別問題均各陳觀點。最後，也有相互的競爭。但是曼德爾指出：

「在另一方面，應該注意最緊要的一個事實，即雖然在報

紙與報紙之間存在的有尖銳的不調和，但他們却没有觸及根本的問題。關於我們所認為是基本的，報紙常常是一致的。

「那些為各報紙所支持的『基本的』感覺和見解到底是怎樣的呢？這首先是精明社會經濟制度的感覺和見解。這就是出版家及其友輩就是在這個制度下繁榮發展起來的。這就是王室的威力和有錢人的威力；『自由』報紙的威力；承認商業對於文明是必需的；相信投資的神聖以及一種廣闊的思想，即普通的澳洲人覺得當大的工業公司掌握在私人手中比它們屬於全體人民時，他還要更『自由』些。

「為了保護這些基本的感覺和見解報紙常常在努力利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和影響。」（原書六十三—六十四頁）

在拆穿關於新聞自由的神話，稱報紙為民主的敵人的時候，曼德爾企圖由這種狀況中找一結論：他提議用立法的手段創立一「報紙委員會」以監督報紙，以便使它們登載「關於各種事件的正確和公平的情報，報導確實的消息並對於各種分歧的政治見解給以近乎平等的可能發表的機會。」他提議由報紙老闆的監督下解放報紙的編輯和編輯部的人員等等。報紙企業的私有權他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我們有義務來報答作者的好意，不必同他爭執關於在昂格羅撒克遜的民主條件之下有沒有可能實現他那烏托邦的計劃。他自己大概也不大相信它的實現性。曼德爾的著作的價值並不在他少現實的實際的建議。他的書的意義在於暴露了事物的真實狀態。曼德爾無慈悲地切開了資產階級新聞自由的標本，把它由裏向外翻出來，從它身上搖落了一切腐朽的碎屑並且指明，在昂格羅撒克遜的報紙上發表輿論自由的民主保證不過只是套着一層華麗而偽善的錫箔罷了。

（譯自「新時代」第九期，一九四六年五月）

論蘇聯的言論與出版自由

I·茲波羅夫斯基著

一六

為適合勞動者利益並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起見，由法律保障蘇聯公民享有下列各項自由：

- (一) 言論自由，
- (二) 出版自由，
- (三) 集會自由，
- (四) 遊行及示威自由。

公民此種權利之保證為：印刷所、紙張、公共場所、街道、交通工具、以及其他一切為實現此種權利所必要之物質條件，均供勞動者及其組織享用。(蘇聯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

要瞭解蘇聯民主的特殊性，必需注意到，蘇聯公民不僅有各種廣泛的民主權利，而且具有實現這些權利的堅強保證。這是指蘇聯公民所享受的一切權利而言，其中也包含着言論與出版的自由。

根據蘇聯法律，蘇聯的全體公民都享有言論與出版自由。這個權利保證一切適於公眾集會的場所，所有的印刷企業，造紙工廠都是全民的財產。如果蘇聯的公民——工人、農民、職員、知識份子、手工業者，各種年齡，職業和民族的人們，男人和女人——想要有組織地集會和討論國家政策的各種問題，談論自己的事業和需要，提出自己的要求，願望和意見，那麼不僅保障他們有集會和言論的完全自由的權利，而且各種場所、廳堂、社會和國家的建築物都可供他們自由使用。如果任何的勞動者的組織——職工會、合作社聯合會、文化協會、青年團體等——想要出版自己的機關報——報紙或雜誌——那麼它不僅有出版的法權，而且它還可以使用紙張，排印的機器以及必要的銷行和交通工具。由此可以說明了沒有一個國家有像蘇聯那樣的廣闊的報紙網。除了莫斯科出版的大量的中央報紙和

用蘇聯各民族語言出版的紙報之外，在各加盟和自治共和國的首都，在每個加盟和自治共和國，在國內各州和各區，在蘇聯無論大小的工業運輸或農業企業，沒有不出版自己的報紙的。這些報紙稿件份數多的，因為它們的印量甚多。除此以外，在每個工廠內之專門工場、集體農場、產業組合、機關、部隊、學校都出有壁報，所謂壁報者，即用手寫或打字機打好之後再張貼在牆上。這一切說明了蘇聯公民所享受的出版自由是異常廣泛的。

蘇聯公民在集會上或報紙上有權批評政府的機關嗎？是的，在蘇聯社會的監督和社會的批評是所有的政府組織和機關正確工作之最重要的條件，並且這裏監督和批評還受到各方面的鼓勵。如果某個政府機關或它的個別工作人員在自己的行動中迴避執行國家的法律或破壞它，如果有公務人員不盡自己的責任或濫用權力，那麼在集會或報紙上對於這些人的批評，常常會得到政府高級機關國內社會輿論的贊同與支持。

由此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每天在任何的機關報上，在中央和地方的報紙上都可以讀到許多批評各個別機關和人員的記

事、論文、書信、而不管他們官級高低。特別顯著的是這些批評材料的作者，多半是來自民間的普通人士，報紙的編輯部樂意將自己的篇幅許予他們。在各大報紙的編輯部都有專門的「書信科」以最大的注意來研究蘇聯公民所寫來的大量的信件並盡力助成去除此信裏所批評的不正常的現象。任何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地位多高，都必須回答任何公民所提出的批評或問題，必須儘快去除此缺點，改正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都是由批評者對他指出來的。蘇聯法律盡力保障公民的權利，他們可以利用言論自由以作公正的批評。如果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即受到批評的政府官吏，不去改正他的錯誤，反而迫害批評者的利益，那麼法律是永遠是維護後者的。

在蘇聯言論自由不僅是作為公民的司法權，而且也是千百萬人政治活動的手段和引導他們有意識與有組織地參加國家和經濟的建設。共產黨和政府有興趣要使更多的公民能更多地參加社會政治的活動，儘量行使賦予他們的權利。由全國各個角落來的代表所參加的各種各樣的大會，高級政府機關的領袖和來自民間的普通人士的會議在蘇聯是普遍的現象。在這些會議上，一些單純的勞動者，雖沒有官階，但具有很多的生活經驗和知識，坦白自由地表示他們對於政府工作各種問題的意見，參加制定法律和編組文化與經濟生產的計劃，提出自己的建議和忠告，他們認為對於事業不利和有害的必加以責難。一切合理的指示，意見，提議都被政府當局各機關加以採納並在制定法律和政府命令時加以考慮。在蘇聯言論自由所起的積極作用的顯明的例子可由下列事實看得出來，即蘇聯新憲法的草案，在它未提交蘇聯國會審定之前，曾交由全體人民公開加以討論，結果蘇聯國民所建議的許多補充和修正都採納於憲法的條文裏

在蘇聯言論與出版自由有什麼限制嗎？對於利用這種自由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鞏固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人豈沒有任何限制的。因為這種制度的勞動者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勞動，自己的鬥爭所建立的。對於那些想利用這種自由來違反人民利益的人們，却有所限制。如果有人想利用口頭上的言詞或報紙上的文章來傳播民族間的仇恨，唆使一個民族來反對另一個民族，那麼這種人無論是在會議上還是在蘇聯的報紙上都找不到用武之地。為什麼呢？因為蘇聯的社會建設在民族平等和友愛的基礎之上的，如若有人企圖用言論動搖或破壞這種友愛，那麼他就要被認為人類恨惡的傳播者。蘇維埃國家的法律要嚴厲地制裁那些宣傳民族和種族歧視的人們，認為這種說教是謀害蘇聯社會制度的基礎，謀害人民的和平生活並且是戰爭的煽動者。